

◎文学新地理⑦

河南文学：厚重而多元

何 弘

中原作家群是一个以中原文化为背景的庞大创作群体，既包括坚守在本土的河南作家，也包括寓居外地的河南籍作家。新时期以来，活跃作家的数量、创作成就以及实力和影响，地域性创作群体能与之匹敌的不多。

从宋金对峙开始，中原屡屡成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争夺政权的主要战场，加上黄河的屡次泛滥改道，苦难成为中原人最基本的人生体验。长期的苦难体验，长期的不屈抗争，使河南人形成了直面苦难、坚忍不拔的生存态度，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机智以及狡黠投机的性格。这使得河南人面对苦难时既有勇于正视、顽强不屈的一面，又有善于变通以求生生不息的一面。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河南人特有幽默和坚韧，在表现上则以厚重而风格多样为基本特点。这样的创作特征从中国新文学发端起一直延续到整个新时期。

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

进入新时代，中原作家群继承保持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在题材和表达上大胆开拓，改变了之前以乡土题材和历史题材创作为主的状况，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开拓题材领域，表达也更加多样化，开创了新时代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具体来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作家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不断有优秀的新作问世；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创作走向成熟，开始成为中原作家群的中坚力量；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开始崭露头角，继承中原作家群的优秀传统并有所创新，保证了河南文学队伍梯队的完整。

近年来，周大新一保持着良好的创作状态，相继出版了反腐题材长篇小说《曲终人在》和反映老年人生活状况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曲终人在》是周大新对反腐题材小说创作全新开拓的结果，作品不回避人性中复杂幽暗的成分，但更多地表现了主人公在为社会发展、为百姓做事等根本问题上，踏踏实实所做的一切，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天黑得很慢》关注中国社会老龄化现实问题，写出了生命的蓬勃与死亡、爱与疼惜。李佩甫继《生命册》获



二月河



李佩甫



周大新



乔叶



田中禾



邵丽

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又创作出版了《平原客》。李佩甫的作品从底层人物不断向中低层官员、城市白领、企业精英、知识分子拓展，终至《平原客》开始描写高级知识分子、中高级官员，延续了他一贯描写在特定文化土壤中人性的生长的主题，并有新的开掘。刘庆邦的《黑白男女》描写的是三个死难矿工家庭面对灾难互相温暖、自尊自强自立的故事。他的散文《我就是我母亲》则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作者在母亲病重离世的日子陪伴母亲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视角独特、思想敏锐，表达了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深深的感恩之情。田中禾继《父亲和她们的十七岁》之后又创作了《模糊》，仍然是通过主人公的人生经历表达对人生、社会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刘震云等作家也有新作面世。这些作品在题材的开掘上，显然已不能再沿用“乡土小说”进行简单的概括，而是与时代发展同步，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更为广阔的生活。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尤其是其中的女性作家，则走出了以个人情感体验为主要描写内容的局限，开始更深入地关注广阔的社会现实，作品变得深沉而厚重。邵丽以其挂职经历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大河》等，直面当下社会问题，在表达上更加朴素真实，却更加有力。乔叶从《拆楼记》开始创作出现明显的转向，作品不再重点关注情感体验和身体性体验，而是开始关注社会现实，特别是《认罪书》，显示出

人性和灵魂拷问的力量。《藏珠记》则是探索新的表现手法的大胆尝试。梁鸿继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之后，创作了虚构作品《神圣家族》和《梁光正的光》，作品重在表现普通人内心的“光”，即对远方和理想的追求，殊为难得。计文君的《化城》表现的则是生活在北京的“北漂”对理想生活的追求。申剑近年来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表现出强劲的气势，作品切实地指向了当下社会问题和人的内心世界，表达相当到位。

揭示个体和大时代的关联

赵大河注重叙事的先锋性，注重揭示个体生命和大时代之间看不见的关联。赵瑜常常从日常生活细小的切口入手去表现当下人物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继二月河之后，历史小说依然在河南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较大比重，程韬光以其对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著名诗人的持续书写而引起关注。作为小小小说创作重镇，河南拥有一支庞大的小小小说创作队伍，张晓林以其笔记小说创作独树一帜。

2016年，河南省文学院根据中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选取安庆、尉然、宫林、张运涛、赵文辉、李清源、陈宏伟、南飞雁（以出生年月为序）等8位小说家集中进行研讨，名为“中原八金刚”。8位作家中，南飞雁的写作主要以机关普通公务员为描写对象，表达他们面对复杂人际关系时微妙的内心体验和

生存现实；安庆注重语言美感，而且对社会现实的表现细腻独到，对人物内心的揭示深刻敏锐；陈宏伟的作品对人情世故和人性有深刻体察，使看似普普通通的生活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味；李清源的写作则更多对命运的探究和精神的探索；尉然的作品带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在对生活夸张以至荒诞的表现中，对农村生活的现实和底层人的命运做出了有力的表达和深刻的揭示；宫林的写作更为质朴，更多以正面强攻的姿态来真实表现农村生活的现实和生活在其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与心理；张运涛对当下现实的认识和表达真实而准确，作品重在通过对个体的深入把握；赵文辉以对农村现实的洞悉与表达为基调，常常让平凡的故事变得动人心扉，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深刻的启示意义。此外，更年轻的作家如张艳庭、尚攀、智啊威、墨柳等也都开始显露出各自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而活跃在北京、广东等地的郑在欢、寒郁等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散文诗歌作品丰富

河南的散文写作这些年也相当活跃。除王剑冰、鱼禾等专业散文作家之外，不少小说家、诗人、评论家也都不时有散文佳作问世。陈峻峰的《闽南纪行》、青青的《落红记》、胡亚才的《水的血脉》等都值得称道。近年来，河南有一批年轻的散文写作者崭露头角，阿慧、韩晓民、叶灵等是突出的代表。河南的诗歌创作形成了郑州、信阳、平顶山、周口、开封等多个群体。在河南的众多诗人中，蓝蓝之后，扶桑表现得非常突出，她更多通过日常的生活意象书写个人的内心生活，作品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高金光、张鲜明、吴元成、温青对社会与自然也都有着良好的诗性表达。儿童文学方面，孟宪明以其《念书的孩子》《青石白》《花儿与歌声》持续书写着农村儿童，引起了广泛关注。肖定丽也屡有佳作问世，同时周志勇、潘红亮、韩宏蓓、原草等也开始引起关注。特别需要提起的是网络文学，柳下挥、庚新、度寒、高阳、苏迷凉、九呼、豫西山人等都相当活跃。但与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相比，河南网络作家中的大神级写作者还相对较少。

总体来说，新时代，中原作家群仍然保持着老中青相结合的完整人才梯队，继续关注现实，注重对作品价值和意义追求的优秀传统，以现实主义为基调，题材开掘更为全面，作品表达更加多元，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作者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

◎评谈散文·散文的现代性



现代性潮流带给中国散文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正能量

新颖而深入的现代性

古 耜

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样式而言，散文较之小说、诗歌和戏剧，更多衔接着“国粹”基因和民族血脉，其在精神与外在形貌也主要体现了传统的特质与风范。然而，现代散文既然以“现代”为标识，和现代小说、诗歌、戏剧一样，都是绽放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文学之花，那么它就无论如何避不开“现代性”，这是一个寓意繁复、歧义颇多的概念，本文尝试着将其通约为现代社会、文化和心理的一切特征的关联与纠葛。因此，透过现代性视角，考察散文的特质与新变，是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

现代性概念发轫于西方，鸦片战争以降开始进入中国。这决定了我们今天探讨散文的现代性，必然要涉及“西学东渐”的大背景和“拿来主义”的大关节，也必然要联系西方现代思潮和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散文的影响与渗透，以及二者之间的会通与对话。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和此后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散文出现的崭新景观：一些散文家接受西方人本主义学说的影响，在创作中毅然摆脱相沿已久的单纯“宗经”“载道”的惯性，开始追求从个体出发的独立思考与自由言说，努力实践“意在表现自己”的美学主张。正如郁达夫所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在新的散文观念的助推下，若干得风气之先的散文家，相继推出带有异域营养的新颖之作，其中鲁迅的《野草》迄今仍是现代散文难以逾越的高峰与经典，而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何其芳的《画梦录》、梁遇春《春醪集》、《泪与笑》、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等，亦在时光的淘洗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生命力。新散文的新观念和新作品比肩而至的，还有其新技法与新样式。就前者而言，传统文章鲜明的象征、荒诞、反讽、幽默等屡屡现身；依后者而论，美文、絮语、小品、随笔以及散文诗等竟显意趣。所有这些似可说明，就整体而言，现代性潮流带给中国散文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正能量。

历史抵达新时期，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现代性问题不仅无远弗届，无微弗存，越发显示了强烈而充分的存在感，而且同近半个世纪崛起后的现代思潮缠结在一起，传递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正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的当代中国，也自然而然地投射于作为民族心史的现代散文。于是，在一大批优秀散文家笔下，我们看到了更为新颖也越发深入的现代性言说：

现代性具有的多面性和悖论性引发高度关注。体现了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现代化，构成人类的美好向往与前行动力，然而派生于这一过程的现代性，却是一种多面向、多路径、极复杂的存在，其中不乏马泰·卡琳内斯库所揭示的对抗、反叛、危机、断裂（《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些敏感的散文家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反映到创作中，便形成了对现代性的清醒审视与辩证解读。譬如，赵鑫珊的《人类文明的功过》、鲁枢元的《心中的旷野》、王开岭的《古典之殇》、田松的《稻香园随笔》、杨文丰的《病盆盆》、唐克明的《空约寒江》等一批作品，或发掘大自然的伦理，或针砭现代人的短视，或反思工业文明的缺失，或探讨绿色发展的要义，均透过开阔的视野和充足的事实，分析着因现代性而生的是非成败，特别是内中的歧途与盲点，可谓真知灼见的醒人与警世之言。而在这方面更见执著坚韧也更显睿智高蹈的当属韩少功。出自其笔下的《夜行者梦语》《世界》《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进步的倒退》等篇章，抓住后现代潮流、汉语根性、生态保护、文明悖论、人工智能等重要问题，精辟解读人类现代生存的奥妙与前景，其效果常常是振聋发聩或醍醐灌顶。

现代人特有的快节奏生活和复合性体验进入作家视线。现代性是“从短暂无常中抽取永恒”。波特莱尔对现代性所作的预言性描述，已被当下生活所证实。如此光怪陆离、变幻不居的社会存在，让精神在场的散文家每有所感与所悟，进而从身边的复杂生态入手，展开对现代性密码的破译。这时，我们读到楼肇明的《惶惑六重奏》、冯秋子的《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彭程的《急管繁弦》、张立勤的《痛苦的飘落》等若干颇具浓烈性和穿透力的精彩之作。而将这类书写推向一个整体高度的则是南帆，从早期的《叩访感觉》《读数时代》到后来的《神秘的机器》《房价的豪赌》，再到晚近的《舌尖上的安慰》《出镜》，作家对现代人性与物性的剖析与描述，总是灵思迭见，神采飞扬，尽显思想者的智慧与风度。

打上现代印记的创作观念与表达方式获得积极尝试与成功实践。1963年，在台湾的余光中率先倡导“现代散文”，并提出以语言表达的“弹性”“密度”“质料”为方式和路径。这一倡导实际上衔接和呼应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潮流，从而成为汉语散文新一轮变革的先声。30年后，出现于大陆文坛的“新生代散文”和“新散文”群体，以开放的文体、实验的手法、陌生的修辞，以及更切近生命本体的语言意识，重新开启现代散文的实验，推出了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其中祝勇、张锐锋、刘亮程、周晓枫、江子、蒋蓝、格致、李娟等人的创作，更是凭借不断总结、不断扬弃、探索前行的状态和实绩，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对于这些，今天的评论界理应给予认真总结。
(作者为辽宁作协顾问)

◎新作评介

语言的温度和文学的广度

——读白舒荣《海上明月共潮生》

朱云霞

第一次见白舒荣老师是在一次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每一位作家的发言都会提到自己作品的知遇者白老师，而她安然、优雅又低调，对我来说犹如一个“文学”之谜：她以怎样的方式发现了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字？以怎样的情怀推动他们在大陆的传播？又是怎样的热忱让她几十年如一日深爱着海外华文文学这方“边缘”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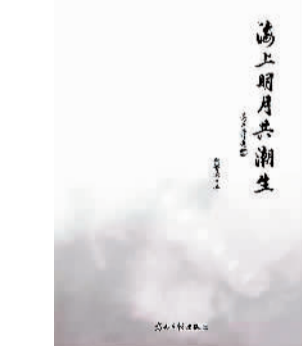
阅读她的评论文章，我才恍然，她对文学和方块字的珍爱，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编辑者的敏锐和工作习性，更源于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个“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理想主义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文化人，自觉不自觉地肩负着一种使命感”，在她看来，“作为母语国，理应为异域他乡的华文作品提供展示的舞台，理应将这辛勤耕耘的华文作家和作品介绍给世人”。从《回眸——我与世界华文文学的缘分》（2010年）、《华英缤纷》（2016年）到《海上明月共潮生》（2018年），阅读她的文字犹如走进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现场：办刊的曲折和执着，与作家沟通往来的真诚，文人相敬的雅趣……也因此，她的文学评论不同于学院派的学理性解读，她的语言是有温度的，观看的对象是作者也是朋友，而作品是审美的对象亦是她所呵护的花蕾，这些带有阅读札记、评述、研究性质的文章，综合起来就是一个编辑家所呈现的文学的广度。

说作家、说作品时白舒荣从来都不是一个旁观的编辑者。在以文字摹写作家素描时，她会带人评论者自身的情感，把作家当做朋友，在文学之外用生活交往中的感知体现他们的互动，从日常再现作家的内心和性格。比如，写陈若曦，一句“我与若曦相识甚久，在她美国的家、台北、上海、北京，曾多次相聚”，就让我们看到陈若曦个人生活变化的轨迹和人生阅历的丰富，而“走笔至此，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短发，T恤，拖着拉杆箱的精干身影。这是今年七月，若曦路过北京时，留给我的”就把一个最近期的作家形象“素描”出来，是君子之交的旧友，亦是因文学而相聚的知音。又如，写高阳独特的个性是通过饮酒和说话的关系：“说他嗜酒如命，可能并不过分。酒对于他是食粮，是兴奋剂，是话匣子，几杯酒下肚后，人全然鲜活了起来。”作家的形象和特征如在眼前，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沉入历史深处编排叙事的作家，还是一个从日常走来的性情之人。

白舒荣对作家更看中文品和人品的协调一致，看重知识分子的气质和胸怀。她说黄春明是“作品和人品既经得起‘远看’也经得起‘近瞧’”的作家；而陈若曦是“坚持理想、无怨无悔”，一个被祖国文化深深吸引的非凡女性；杨逵则是铁骨铮铮为理想主义坚守的斗士；挖掘历史真相的蓝博洲是一位

执著认真的探询者……如此，通过几位台湾作家，就向我们呈现了台湾文学的厚重，从日据时期的左翼坚守，到后来一代代对家国情怀的实践，笔触之下是肯定和赞赏。白舒荣写香港的曾敏之、潘耀明，陶然、张诗剑、陈娟等，也都以情义和他们对文学、文化事业的热爱写出香港文化人的执著，向我们展开一副文人相交的图卷，图卷的底色是跨越时空的从文字到文字的深情，亦从个人体验的角度勾勒出香港与大陆几十年间的文化交融。

不仅如此，白舒荣写作家，看作家，常常又是一种“拥抱”的姿态，这种“拥抱”是通过文学相识的默契，更是一个编辑从友人的角度给予的体恤和关爱。比如写陈瑞林：“她是我们共同的好友，也是我们友谊圈子里可爱的开心果，哪里有她，哪里就有欢声笑语不绝。”这般亲密的情愫因文学的结缘而轻柔美好，更因对文学和作者的懂得，才如此赞叹：“创作和评论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往往难于同时兼顾，但瑞林做到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写张翎时她写到一个细节，看到张翎和丈夫参加抗议活动游行的照片和现场镜头时，“不禁热泪盈眶”，这样的热泪盈眶不仅是对作家的拥抱，还有她对海外华人“中国心”的动容。这种“拥抱”有时候更多的是对作家的鼓励和肯定，正是在这样的“拥抱”下，许多作家的作



白舒荣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品经过白舒荣的选择和审视进入大陆的文学期刊，也正是这样一个编辑者对文学的热情鼓舞了异国他乡徘徊在文字世界的写作者们。

白舒荣说，友谊是一种相互吸引的感情，可遇而不可求。因文学而结缘的友情应该是醇厚美好的，在这文缘之中，她见证了他们和他们的成长，也见证了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的传播，正如赵淑侠所言：“与每一位友人的交往，都是她人生中的新篇章，也是工作心得——她的工作便是联络中国大陆以外的华文作家。在这方面，她经验够丰富，成就斐然。”这是生命的分量。《海上明月共潮生》所论及的作家从台港到美国、欧洲、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再回到中国现代作家，虽非刻意为之，但这种编排却形成有意味的架构，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时空流转，那些作家、那些文事在文学和汉字的沟通中显现出“华文文学”的跨越性、整体性特征。而在区域空间之外，是时间的历史感——从上世纪1980年代到2000年之后，散落的篇章勾勒出不同作家的特性、记载了文坛往事，以语言的温度体现一个编辑者的热情和真诚，以个体视角刻下时光之外的文学广度。